

事件观

BINGDIAN WEEKLY 冰点周刊

十年了,依旧没有人幸免于罪

徐百柯 李润文

两个孩子,一个3岁,一个1岁,死在家中,死于没人照看,幼无所依...

6月21日,南京市江宁区泉水社区民警发现这两个幼女死亡,其母乐某下落不明...

中国青年报记者赴现场采访,民警告知,正在对两个孩子进行尸检...

然而翻看9年前的一篇冰点特稿,定论,像一个耳光扇过来——没有人幸免于罪...

2003年6月21日——没错,整整,整整十年前——成都3岁幼女李思怡被发现死在家中...

康晓光在书中说:“3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。她要打开门,这是她唯一的生路...”

书名《起诉》,是有良知者的耻辱感对自己的起诉,不需要法医鉴定,也不可能有任何开脱...

避暑

6月18日,山东省滨州市,几位农民工为躲避酷暑,干脆把凉席搬进水泥管,还点上了蚊香。

高立萌摄

起诉,已然开始,也必须开始——门外,除了整整10年的时间,依旧是你和我,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。

正如10年前有网友为纪念李思怡所说:一个民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,以这种方式死去,是所有人的耻辱。

面对李思怡惨剧,康晓光曾追问过,除了需要承担刑责的当事人,其他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转身离去吗?

10年过后,一些事情进步了。社区负担了乐某一家三口的最低生活保障,邻居们也并不是那么冷漠...

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。然而结果让人浑身发冷: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,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...

事实是,李思怡的母亲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,没有人和她来往,她也有自知之明,从不和邻居来往...

进步还远远不够。永远别在门外装聋作哑。门后,还有那么多无声的人、无权的人,他们在得到承诺之前死去...

们提供了不少帮助。但一些“死胡同”仍在。比如,足以确定乐某不适合做监护人后,并没有法规能保障后续措施...

一种精致的冷漠依旧暴露于两个孩子的死亡面前。中国青年记者在采访社区干部时被告知,“乐某没有户口,不属于我们社区的人,不归我管”...

对策,甚至“她不来找我,我怎么可能去找她呀”。

记者注意到,社区会议室里摆满了各类荣誉奖牌。

距离这个城郊社区几百米远处,京沪高铁动车组呼啸而过,把路边的破旧建筑和堆积的垃圾甩在身后...

当年康晓光写道:“李思怡的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,但比这更可悲的是她并不是第一个,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。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!”



武汉城管咋就里外不是人”

本报记者 郭建光

这段时间,武汉市城管像是骑上了脱缰野马,在舆论场上狂飙。

大约半个月前,有网友发现一名来自武汉市洪山区的城管工作人员,白天穿着制服执法,晚上却在武汉市繁华地段摆摊。

当公众还沉浸在“卧底”城管的争议声中时,有关武汉评选“最差城管”的新闻再度成为舆论焦点。

接踵而来的质疑声让武汉市城管会新闻宣传负责人深感委屈。此前,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:“我们强力管理,被指责暴力”...

“有创新就有争议。我们不怕争议,只要能把城市治理好。”对此,武汉市城管会副主任朱建华平静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。

不管城管做什么,好像错总在城管

“不管城管做什么,好像错总在城管。”参与“体验执法”的桂文静表示不解。一个月前,他和同事杨希扮成小贩,希望能够在城管执法者的生活。

他把这个想法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希商量,两人一拍即合。汇报到局长处,局长立即表示赞同,并与局党委书记合计,叮嘱二人“秘密”进行...

两年来,有关武汉城管的争议新闻总是成为舆论焦点。从“眼神执法”到“鲜花执法”,从“举牌执法”到“体验执法”——在一场名为“城管革命”的改革中,有关部门努力寻找暴力执法之外的执法手段...

2012年,洪山区城管局又尝试了“鲜花执法”。商户将经营物品摆到店外,属于违规经营,城管在上前纠正后,临走时还送上一枝红玫瑰。

这些举措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的“城管革命”。2011年,武汉市发旨在改变城市形象的“城管革命”。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唐良智承诺:“3个月环境明显变化,年内城市大变样,3年要达到国内一流。”

在这场“革命”进行过程中,城市管理纳入市政府对区政府的考评系统中,并有相应的考评机制。其中占道经营是很重要的考评内容。另外,非执法类的环卫等也是考核内容。

“压力很大。各区都要各显神通,把城市管理搞上去,不然要被问责。”李运祥笑道,“每次考评时都提心吊胆。”

洪山区是武汉市最大的一个区县。在这片2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,摊贩占道经营始终是令城管局头痛的事情。

5月13日傍晚,桂文静和杨希提着从批发市场用500元买来的发卡,到洪山区一个繁华的地方摆摊。

每次体验后,二人还分别将每天的观察,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。他们摆摊销售的商品,为发卡和杯子。33天下班后摆摊的“体验”,他们赚了“不足500块”。

桂文静妻子经常开城管丈夫的玩笑。她曾不止一次对幼年的女儿说,要是有人问起你爸爸是做什么的,你就说是保安。

桂文静丈夫经常开城管妻子的玩笑。她曾不止一次对幼年的女儿说,要是有人问起你爸爸是做什么的,你就说是保安。

在“城管革命”中,文明执法是一项重要内容。各区城管局内部都有考评和问责机制,并实施“三步式”执法程序,即“教育规范——限期整改——依法处罚”。

朱建华也曾公开强调:“坚决反对暴力整治占道夜市。”同时,武汉市城管会还呼吁社会对城管执法行为进行监督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武汉城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执法方式。除了“眼神执法”和“鲜花执法”,武汉市江岸区城管执法人员还进行过“举牌执法”。

桂文静妻子经常开城管丈夫的玩笑。她曾不止一次对幼年的女儿说,要是有人问起你爸爸是做什么的,你就说是保安。

桂文静丈夫经常开城管妻子的玩笑。她曾不止一次对幼年的女儿说,要是有人问起你爸爸是做什么的,你就说是保安。

桂文静丈夫经常开城管妻子的玩笑。她曾不止一次对幼年的女儿说,要是有人问起你爸爸是做什么的,你就说是保安。

桂文静丈夫经常开城管妻子的玩笑。她曾不止一次对幼年的女儿说,要是有人问起你爸爸是做什么的,你就说是保安。

桂文静丈夫经常开城管妻子的玩笑。她曾不止一次对幼年的女儿说,要是有人问起你爸爸是做什么的,你就说是保安。

的管理部门、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、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、没有统一的管理队伍。因此,只能在“摸索中前进”。

“一个城市不能没有管理者,一管又容易产生冲突。”朱建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,“我们饱受质疑,但不放弃探索。”

近年,武汉市城管会积极推动城市管理机制建设。去年11月28日,武汉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,通过了武汉市第一部城管“母法”,即《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。

各区城管局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变化:经费充足。每个城管局,都雇佣有相当数量的“临时工”,即“协管”。仅洪山区,就有近600名协管。

早期,武汉一些县区及街道的城管,没有充足的经费。在朱建华看来,一些城管为维持运作,不得不“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收”。

作为武汉市城管会的一名负责人,在推动城市管理改革时,朱建华深感“压力大”。

有不同的领导人评价武汉,一说武汉像个“大县城”,另一说像个“大工地”。

在过去的多年中,武汉市年年争创“国家卫生城市”和“全国文明城市”。当湖北省别的地级市前后获此殊荣后,省会武汉始终与其无缘。

“相当于嘲笑我们的管理水平。”朱建华笑着说。不过,他也坦言,与城市发展相比,武汉的城市管理水平,至少落后“10到20年”。

尽管一些改革得到认可,但对于目前的占道管理,依然找不出好办法。洪山区城管局,曾与一家单位商量好,将其空地辟出来,让小摊贩入内经营。

“以后我们也许还会受到质疑,但我们在前进。”朱建华站起身,“能把城市治理好,才是我们的目标。”

而“一夜成名”的桂文静和杨希却不太承受得住舆论压力。杨希现在出门就要戴墨镜,怕被别人认出来。

朱建华总结道,城市管理“五个没有”:没有统一法规,没有统一自上而下

新闻闻见

张莹

错位的时间

又到一年毕业时,翻看江苏省宿迁中学2013届高三毕业纪念册,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:无论后排年轻的面孔变了多少次,前排的13个领导永远保持着同样的姿态...

虽说照片看起来天衣无缝,对比之下明眼人还是能够一眼看出:领导们的形象是PS上去的。对此,校方回说,除了一张是现场拍照,其余都是后期合成...

校方的回应引来了多方的一片嘘声,有人提起2010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杨卫,特意抽出一天半的时间亲自与8000多名毕业生握手留念的事情...

难以想像日后学生们看到照片里第一排端坐的领导,而记忆中前排却是一片空白的时候,会是怎样错位的感受。毕业之际,学校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几年来的教育,更是一份纪念与期许。

错位的剪辑

眼见未必为实,视频剪辑线上两个时间点的错位对接,足以颠倒一个事件的因果,混淆人们的视听。

几天前,一段“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青浦分院护士抡板凳砸病患”的视频在网上被大量地转发。视频里,一名护士在与病患发生口头争执之后,突然猛地抡起眼前的板凳向其中一名男子砸去...

本应是白衣天使化身凶神恶煞者,此视频被公布出来,立刻引起多家媒体和大众对医护行业的口诛笔伐。人们会不自觉地联想起前些日子护士狂扇ICU女婴,护士扇病患巴掌等种种负面新闻...

经过深入调查,才发现这又是一场未经求证的道德审判。网上流传的这段视频是经过剪辑的,剪辑者刻意将双方的口角和护士动手打人组接在一起,却剪辑了这两段中间护士被画面中男子辱骂掌掴的片段。

错位的剪辑带来的是错位的解读,倘若媒体从业者不能站在客观真实的角度报道事件,长此以往,只会造成社会上行业间的嫌隙越来越大。媒体人轻点鼠标剪辑的或许只是工作上的一个视频片段,割裂开的却是理解与沟通的理性空间。

错位的符号

荣誉带来的并不总是荣耀和羡慕,有时也会带给人莫名其妙的错位之感。在最近举办的山西十大文化符号的评选活动,一个名叫耿彦波的人以154万多的票数狂甩晋祠、关羽、云冈石窟几条街,暂居第一位。

许多人不禁要问:耿彦波是谁?当了解到他的身份是太原市市长、活动主办方是山西省文化厅以后,人们的反应变成“主办方‘拍马屁’”。还有网友发现,所谓的投票并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,可以通过假名等手段反复投票。

活动的总策划耿彦波表示,此次评选是按照人物类、景观类、建筑类和美食类等七大类,由企业或个人两种形式进行报道,经组委会对申报材料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行筛选后才能入围。对于网友们对市长大人高票领先的质疑,主办方解释这恰恰反映出当今社会民众对实干官员的喜爱。

不解释还好,经此一折腾更添错位之感。不可否认,耿彦波在山西享有非常高的声誉,在大同任职市长的时候,他曾享有“造城市长”的美名,在全票当选太原市市长后离开大同的待遇,更是受到当地市民挥泪相送的待遇。

但问题是,为官者做好分内之事就能成为文化符号,甚至超越数百年就成为历史名人,数千年的文物古迹?此次评选的并非山西最受欢迎的官员,究竟是广大群众不理解文化的意义,还是评审委员会的专家的偏爱对符号的理解?